

摇摇摇 目 录

引言..... 员

第一编 1917—1919年的写作理论

第一章 概述..... 猿

第二章 综合性写作理论..... 员

第一节 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员

第二节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 猿

第三节 刘师培的文章理论..... 苑

第三章 文学写作理论..... 圆

第一节 陈廷焯、况周颐、王国维的词话..... 圆

第二节 梁启超等人与小说界革命..... 獭

第三节 管达如的《说小说》与吕思勉的《小说丛话》..... 濂

第四节 胡适、陈独秀、周作人与文学革新..... 缘

第四章 专题性写作理论	边缘
第一节 摇来裕恂的《汉文典·文章典》	边缘
第二节 摇林纾的《春觉斋论文》	苑
第三节 摇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	苑

第二编 1919—1949年的写作理论

第一章 概述	愿
第二章 综合性写作理论	愿
第一节 摇陈望道、高语罕与龚自知的文章作法	愿
第二节 摇叶圣陶与夏丏尊的作文论	愿
第三节 摇毛泽东的文章写作观	愿
第四节 摇朱自清、朱光潜论写作	愿
第五节 摇孙起孟、郭绍虞、蒋祖怡诸家的写作论著	愿
第三章 文学写作理论	愿
第一节 摇鲁迅论写作	愿
第二节 摇茅盾、艾芜、孙犁的文学写作理论	愿
第三节 摇艾青《诗论》与冯三昧、贺玉波、陈光虞的小品文 理论	愿
第四节 摇詹奇的《小说作法纲要》与周钢鸣的《怎样写报 告文学》	愿
第四章 专题性写作理论	愿
第一节 摇钱玄同、刘半农论应用文与陈子展的《应用文作 法讲话》	愿
第二节 摇孙荳工、石苇论记叙文写作与胡怀琛的说明文 写作理论	愿

第三节 摇施畸的《中国文体论》与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	猿苑
-----------------------------	----

第三编 猿缘- 猿怨年的写作理论

第一章 摇概述	猿缘
第二章 摇综合性写作理论	猿苑
第一节 摇朱德熙的《作文指导》与纪纯的《写作方法》	猿苑
第二节 摇复旦大学的《写作基础知识》与北京大学的《写作知识》	猿怨
第三节 摇山西师范学院的《写作知识》与复旦等院校的《写作漫谈》	猿愿
第四节 摇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写作简论》、河北大学的《写作基础知识》与西南地区九院校的《写作知识》	猿园
第三章 摇文学写作理论	猿猿
第一节 摇唐弢的《创作漫谈》与关沫南的《写作初谈》	猿猿
第二节 摇秦牧的《艺海拾贝》与周振甫的《诗词例话》	猿源
第三节 摇李宜山的《写戏常识》与胡可的《匀剧笔记》	猿圆
第四章 摇专题性写作理论	猿愿
第一节 摇吴调公的《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	猿愿
第二节 摇朱星的《新文体概论》与尹思敏的《现代文学体裁知识》	猿圆
第三节 摇王伯熙的《文风简论》	猿怨

第四编 1949—1979年的写作理论

第一章 概述.....	源苑
第二章 综合性写作理论.....	猿苑
第一节 裴显生的现代写作学.....	猿苑
第二节 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	猿苑
第三节 周姬昌与写作学科建设.....	猿苑
第四节 朱伯石、李景隆、胡裕树等的写作理论.....	猿源
第五节 林可夫、尹均生、金长民等的写作理论.....	猿圆
第六节 张寿康、蔺羨璧、程福宁等的文章学.....	猿怨
第七节 中青年学者的写作论著.....	猿员
第三章 文学写作理论.....	源愿
第一节 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	源愿
第二节 李保均的小说论与刘海涛的微型小说研究.....	源缘
第三节 余树森、范培松的散文理论与张德明等的 论报告文学.....	源苑
第四节 林东海的《诗法举隅》与吕进的新诗论.....	源缘
第五节 朱玛、路海波等的影视剧本写作理论.....	源猿
第四章 实用写作理论.....	源员
第一节 于成鲲、李凯源等的应用写作理论.....	源员
第二节 汪景寿、周森甲等公文写作理论.....	源怨
第三节 宁致远、邱世华等的司法文书写作理论.....	源缘
第四节 余国瑞、李秀玉等的经济写作理论.....	源圆
第五节 邝云妙、洪天国等的新闻写作理论.....	源远
第六节 司有和、蒋瑞松等的科技写作理论.....	源员

第五章摇专题性写作理论.....	源远
第一节摇刘胜俊的论文写作研究与王先霏、吴炫的文学 评论写作研究.....	源苑
第二节摇张少康、徐立、李道荣的古代写作理论研究.....	源园
第三节摇徐旦泽的写作运思论与吴应天等的文章 结构论.....	源苑
第四节摇凌焕新、李保初、洪威雷等的写作技法理论.....	缘员
第五节摇吴思敬、陈惠钦论写作能力的培养与都本 忱、刘药药、高原的写作训练研究.....	缘怨
第六节摇金振邦的电脑写作研究.....	缘缘
结摇语.....	缘员
后摇记.....	缘苑

《21世纪写作学文库》总序

裴显生*¹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写作学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在改革开放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中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1984年中国写作学会成立,1985年《写作》杂志创刊,写作学界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标志着学科建设进入了全新的、自觉的阶段。20年来,整个写作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出版、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开拓性的专著、教材和论文,形成了基本稳定的学术“范型”,具有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理论思路和话语风格,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快,人人都要具备写作能力,对写作学科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及时总结本学科的思想理论资料,加快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建设好写作基本理论

*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写作学会会长。

体系和基本功训练体系 ;要深入研究信息时代写作的新情况 ,回答当前写作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探索电脑写作的特征和规律 ,让现代科技在人类文化创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立足写作本体 ,批判吸收其他学科的新成果 ,为“我”所用 ,壮大自己 ;要推进写作课教学改革 ,把感悟生活、品味名作和思维、表达训练结合起来 ,把提高写作能力与提高整体素质结合起来 ;要向全社会普及写作知识 ,推进学术理论的大众化 ,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少年写作的指导……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 ,我和写作学界的朋友们都感到任重而道远。

应该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写作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社长兼总编辑任天石先生、副总编左健先生 ,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写作学的进展 ,从学科建设和社会需要着眼 ,计划出版一批写作学著作。他们多次主动与我商量 ,一起分析了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决定利用南京大学的出版资源和出版优势 ,出版《20世纪写作学文库》。有了初步的计划后 ,又多次召开在宁的写作学专家座谈会 ,听取大家的意见 ,对计划作了修改、补充。作为新世纪写作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在 2000 年春夏之交开始动工。

《20世纪写作学文库》以“库”名之 ,乃求其多 ,拟分系列逐步推出。如“库”中之水 ,源源不断流出。入选文库的著作 ,可分为三个层面 :① 精深的学术理论著作 ;② 各个层次的教材 ;③ 向大众普及的读物。文库要采用写作学科的学术话语 ,体现学科的前沿性 ,努力达到学术性与实用性的和谐统一 ;要站在时代的高度 ,充分体现学科发展的现代意识 ,在追求学术上档次的同时 ,顾及实用方面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努力做到雅俗共赏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该文库由四方面的子丛书组成 :① 理论研究系列。针对前几

年低水平的复制式教材多,高质量的开创性的论著少的现状,该系列要以富有探索性、开拓性的力作打出自己的品牌,坚持高水准、高学术品位,宁缺勿滥,不急于求成,并在出书过程中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

② 译丛系列。在写作学领域,对国外的有关著述的译介,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必须迎头赶上。这项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国外有关写作学著述作一番认真的调查、摸底工作,确定书目;第二步是组织外语水平高又对写作学有所研究的专家进行翻译,陆续出书。

③ 教材系列。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较高学术水平的写作课教师编写高等学校各专业分别使用的基础写作、文学写作、实用写作、边缘文体写作、专业写作等教材,以适应写作课教学的需要,推进写作课教学改革。同时,也要编写出版一批中、小学教师进修的写作教材,供他们自学之用。

④ 青少年写作指导系列。写作基本功训练要从娃娃抓起,这一系列的书,要结合当代生活实际,结合作文教学的改革与创新,用现代写作学的理念、知识,指导青少年练好写作基本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这样四个系列合在一起,就大体上反映出写作学科建设的整体面貌,起到“振兴写作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邓颖超语)的作用。

现在,文库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写作学原理》、《瞿秋白写作艺术论》等书已陆续付印,这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作为写作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中国写作学会理应把它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来抓。我希望中国写作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和广大会员都能关心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提供优质书稿和协助发行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多对《文库》提出意见和建议。大家共同努力,铸造新世纪写作学科建设的新辉煌!

序

刘锡庆*¹

王志彬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经多年苦心钻研、思索、建构、撰述，现已完篇封笔，付梓在即，嘱我作“序”。

这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荣耀”。

这内中的好意我是心知肚明的。过去，我和志彬等内蒙古诸先生、和华北高校诸同人曾多次愉快地合作过。这次，他在事先又确曾很诚恳地邀过我参编，而我却执意未应。之所以不从，原因自然挺多，不过拣其主要者而言实有两点：

一是他这人诚恳好客，谦逊敬人，看重实干，淡视虚名，多创意，善组织，是很会团结、调动各路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去华北地区“写作界”所做的许多大事，如组织大型全五册《中国写作理论辑评》的资料汇编盛举（华北三省二市各编一本），撰著我国第一本《中国写作理论史》的筚路蓝缕的拓荒事业等，实际上都是由他出面组织和领导的。我身体不好，又胸无大志，并不敢奢望

*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写作学会顾问。

于这种颇具难度的“庞大工程”。但可能是沾了地处首都、又是百年名校的一些“光”罢，他每次都拉着、拽着我，赶鸭子上架似地“推”我来做“主编”。这种名不副实、鹊巢鸠据的错位使我常常感到惭愧和不安。故这一次写书他又来拉我做“主编”，你想我怎么还敢厚着脸皮轻易地从命呢？

二是这本书《圆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还有些不同于上述那两本书的特殊情况，这就是“难度”太大！为什么“难”？因为离我们太“近”，近得几乎消解了任何认识、评价的必要的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正是能以凸现由于时间冲刷、岁月淘洗而造成的“历史积淀”的最好触媒——因此，它常为严肃而稳妥的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但现在，却失去了这一条件，让我们这些刚刚迈进圆世纪门槛的人，转过身来立即对刚刚逝去的百年巨变作出科学的梳理和理性的评价，岂不大难？圆年代以前还好说一点，圆年代（即“新时期”）以后就太麻烦、太费难了！因为正是这一时期写作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著者蜂起，新作如林。但内中妍媸并作，良莠杂陈，既缺时间之筛选，更乏实践之检验，而著者却大多健在，要命的是自己也置身其中，那么，取谁舍谁，说多说少，位置先后，评价高低，在众目睽睽、万人注目之下，教你如何下得笔来？又如何能真正做到客观、公正？这困难“吓”退了我，使我不敢染指此事。

现在，书编好了，我可以对以上两点原因或理由做点“反思”了：第一条，我看我做对了，这次终于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不仅使我心安，而且教我高兴！第二条，也正好反衬出了志彬兄的学术勇气，这又是使我打心眼里确很佩服的。

但他还硬是不由分说地把作“序”的差事派给了我。

本来，这书里也写到了我，我理应是予以回避的；再说，有裴、林二位先生做本书顾问，由他们来写岂不大好？但考虑到我此前

已拒绝过志彬一次(参编),这回为一篇区区小“序”再予拒绝,就实在太不够朋友间的“意思”了,因此只好应承下来。

但这“序”确不好写。我上面所谈的写书之“难”,同样带到了这篇“序”里。

20世纪,是迄今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动荡、也最为迅猛的一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期间,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同时,卫星上天、载人登月,现代的科学与技术,也得到了从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促使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急速转变。对老大中国来说,20世纪也是一个革命风云激荡,由封闭自足的农耕社会向开放融合的现代工业社会转折、过渡的激变时期。本世纪初至“五四”前夕;“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建国前;建国后直至“文革”结束;“新时期”直至世纪末等,这正是本书所采用的历史分期——如果说这其中还可容斟酌的话,我以为把“建国”换为“《讲话》”也是有其更为内在的理由的。宏观地看,似乎可以这样说:本世纪是中国不断寻求“现代化”之路,以富民强国的世纪,也是中国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从各方面认真向西方学习的世纪。

这样,20世纪的中国文化,就呈现出了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态势: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革命文化”,还有一种“民间(或曰广场)文化”。正是这几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嬗替和衍进,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洋洋大观。

但当百年过去,新世纪到来之际,情势似乎发生了一些意义深长的变化。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杨义所长在《前线》1999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文化的世纪反省》的文章中说:“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话说,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大致是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这么一个过程或轨迹。这里的‘正题’指的是‘五四’之前中国文化,‘反题’就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帜,而

‘合题’是指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文化创造。”我个人完全赞同他的这一看法。“正题”，即传统文化；“反题”，即“五四”后的新文化；而我们现在既不能复旧，即回归于“正”，也不应继续于反传统的“反”，而应致力于二者的“合”——整合、融合、化合，即回到“原点”，并由此“生出新质”。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重铸和文化出新的事业，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走向。

从这一观点来看，20世纪的中国写作理论史所涵盖的内容，有很小的一部分仍是“正”，绝大部分怕都是“反”，而极少自觉于“合”的超前之作。这是时代的局限，身处其中，如我等之辈自然都难以避免。因此，依我的鄙见，对20世纪的中国写作理论著作，在整体评价上似不宜过高。

中华文化，实际上正是一种建构在汉字基石上的东方农业文明综合体现的“汉字文化”。因此，用我们的母语“汉语（汉字）”写作，就只能走能以体现“民族文化”个性的、自己的独特之路。

实事求是地说，本世纪在基础写作“理论”的研究上，我以为由于有西方异质文化的迅猛而强烈的介入，的确开启了一条全新之路，使之呈现出了新生面，确有较大幅度的推进，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由于生活的剧变和更新，写作的体裁、形式、写法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从客观需要上为“文体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石，本世纪文学、新闻、应用等各种“文体学”的长足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另外，“应用写作”的确有了广泛而普遍的开展，有许多著作如政工写作、经济写作以及外贸、司法、军事、交通写作等等，可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严格说它们还缺乏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但非常明显，所有这些新进展都经过了近百年“反”传统的浸染和影响，大多自然或不自觉地偏离了自己东文的“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今天，蓦然回首既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不能不引起深长的反思。

“正”进入 20 世纪后确已七零八落、气息奄奄，呈现出了破败凋敝、毫无生机的状况；“反”，是文化自救的合于逻辑的进展，是历史螺旋形发展的一种合理轨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贡献。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班前辈们激烈地反传统，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在“汉字落后”之上，响亮地提出了废文言、倡白话的文化主张，为古旧中国的新生开拓了一条生路！这在当时是惟一的、正确的历史抉择。但“汉字落后论”，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学理上说，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是以西方的“表音文字”为先进标尺，然后以它为衡度标准从而粗暴地判定“表意文字”为落后的一种谬误！现在看得十分清楚了：西方的“表音文字”和东方的“表意文字”，走的全然是不同的文化之路，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扬抑或正否其中任何一种，都是片面、错误的！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有分析、鉴别，不能再“反”下去，再简单地重复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所犯的错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才是我辈理应肩负的神圣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正是从这点认识上我才说：对本世纪的“写作理论”著作，在总体上不宜评价过高。

别人不大好说，就说我自己吧。我始终认为，我的那些书如《写作通论》（我写的那些部分）、《基础写作学》、《文学评论的写作》等，“寿命”恐怕都不会太长，也就是 50 年 100 年的生命吧；80 年代很“火”，现在已经较“冷”，再过几年就没人知道，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因此，本书的“评价”怕是太高了！这使得我很惭愧。不服气不行呀：岁月无情，它很难经得起时间的冲刷。有些人也许“自我感觉”始终不错，那无非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儿。

现在，我们正处于经济、科技、信息等“全球一体化”的话语包

围之中。应该说，“机遇”与“风险”是并存、同在的。关键是头脑的清醒！须知：文化，是绝不能搞什么“一体化”的。文化“一体化”了，就会成为人家（西方）“强势文化”的殖民地！文化，只能“多元化”的发展，突出“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性。要警惕“全盘西化”主张的卷土重来！

我这篇不成其为序的“序”，只能在这里打住了。我想，这无疑是一本适时的书，一本需要的书。最起码，这也是一本记述史实、梳理既往、提供资料、录以备考的十分有用的“工具书”。我能为它作“序”，的确是志彬赐我的一种荣耀！谢谢了。

也谢谢读到此书的诸位，谢谢大家！

一九八一年源月底
于北师大塔一楼寓所

引摇摇言

一、《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摇摇 《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是现代写作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史学著作。它立足于世纪之末,千年之交,回眸一百年来我国写作理论的变迁,试图以史为鉴,促进现代写作学的新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写作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时代动因。一则,我国是一个古老的文章大国,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写作实践成果,厚积着极为丰富的写作理论遗产。远自先秦为始,在《尚书》、《论语》等论著中,即包含着有关写作理论的某些片断内涵。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我国最早的写作理论专论和专著。此后,唐、宋各家的文论、诗话、词话,金、元时期的《文辨》、《文说》《诗文规范》,明、清两代的小说、戏曲评点,《文章指南》、《文章辨体》、《论文偶记》、《读书作文谱》等,以及历代许多综合性杂著和笔记、序

跋中,有关谈文论艺的部分,都类属于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的范畴。而20世纪的中国写作理论,虽屡有变迁,但始终与它们血脉贯通,不失其基因和本采,是对它们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二则,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社会变革最为巨大,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猛的阶段。两次世界大战的震撼,声光化电的飞跃,使整个地球由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转化到了神话般的信息文明境界。我巍巍中华,也翻天覆地,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20世纪的中国写作理论,作为此一时期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并不一定都与此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变革同步,时有滞后、超前或相对稳定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它也不可避免地受着社会环境的制约,显示了特有的时代风貌。

扩而言之,古今中外的写作理论,都源于千变万化的写作实践活动。它涵盖着丰富多采的社会内容,具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和深浅不一的层次。但20世纪的中国写作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并不能兼容并包。社会的演变,使它前承后继地形成了特定的内涵。写作理论研究本应与写作教学有所区别,惟长期以来,它却与高等学校的写作教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世纪之初,有代表性的写作理论专著,诸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等,都是他们在高等学校执教时的讲义或教材。五四前后,以迄新中国成立,出版了大量面向中小学生的作文辅导读物,盛况空前。惟在写作理论研究方面卓有贡献和影响的学者,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周树人、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以及陈望道、朱自清、叶圣陶、郭绍虞、蒋祖怡等,大都是学养深厚的学者、教授和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专论或专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品位和实践意义。缘40年代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写作理论著作,主要是清华大学的《作文